

附录 南越国遗存与岭南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卓猛

南越国遗存可以初步划分为珠江三角洲、粤东、粤北、桂东北—粤西、桂东南—粤西南、桂西和越南北部等考古文化区。珠江三角洲区作为南越国核心文化区，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最密切；桂东南—粤西南区与桂东北—粤西区、桂西区之间也存在较多文化联系^[1]。

南越国不同考古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有其文化基础并发挥出历史作用，深刻影响着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本文以南越国墓葬材料为基础，主要讨论南越国不同文化区之间考古学文化因素的交流互动，并概括各文化区西汉中后期至东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越南北部考古文化区由于材料和认识有限，暂不涉及。本文关于南越国遗存陶器型式的表述，均依据本书附录的文章《南越国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一、珠江三角洲区

珠江三角洲区战国遗存发现不多，主要包括增城西瓜岭^[2]、深圳叠石山^[3]、博罗银岗^[4]等遗址，不过有学者认为这些遗址已经进入秦汉纪年^[5]。与发现的较少的战国遗存形成对比，本区秦朝末期至西汉前期的考古遗存非常丰富，这一现象显然与南越国的建立和发展有关。珠江三角洲区西汉中后期遗存较多^[6]，东汉遗存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地点广泛，广州市区^[7]以外，在番禺^[8]、增城^[9]、佛山^[10]、顺德^[11]、东莞^[12]、博罗^[13]、香港^[14]等地均有发现。珠江三角洲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在南越国时期发生了一次大转变，至西汉中后期又经历了一次大转变，其后的发展相对平缓，逐步与汉文化相融合。

珠江三角洲区战国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丰富，包括瓮、罐、甗、罍、缶、鼎、釜、盆、盂、钵、杯、盘等，以米字纹为主，还有水波纹、方格纹、席纹、绳纹等纹饰。战国遗址出土的缶、罍类陶器不见于西汉墓葬，釜、盆、盘等陶器与广州汉墓的同类器物亦不存在演变关系。本区南越国遗存丰富。《广州汉墓》^[15]将 182 座南越国墓葬分为前、后两段，为岭南地区南越国墓葬的分期树立了标尺。

广州罗岗 M3、M4^[16] 出有 A 型 I 式陶瓮和秦代铜戈，属于南越国前期。广州黄花岗 M1^[17] 的 Aa 型 III 式罐、II 式钺和大宝岗 M7^[18] 的 A 型 II 式四耳瓮、三足罐等陶器仅见于后段，且不出前段器物，相当于南越国后期。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仅见于后段的 Aa 型 III 式罐、A 型 II 式盒、A 型 III 式盒、Aa 型 III 式鼎及 Ba 型 II 式釜等陶器，结合《史记·南

越列传》《汉书·南粤传》的记载，该墓属于南越国后期。广州凤凰岗 M1^[19] 早年被盗，根据墓葬形制及对墓主赵婴齐的推测，该墓应属于南越国后期。

广州淘金坑墓地^[20] 出土仅见于前段的 A 型 I 式瓮、Ab 型 II 式甗、Aa 型 I 式鼎，以及仅见于后段的 Aa 型 III 式罐、Aa 型 III 式鼎和三足罐等陶器，报告将 20 座西汉前期墓葬分为两类，分别对应南越国前期和后期。广州瑶台柳园岗墓地^[21] 的 43 座墓葬分属南越国前期和后期。广州农林东路“人”字顶木椁墓^[22] 已遭盗掘，残留陶盒、陶盖等少量器物，期别不辨。

广州秦汉造船场遗址^[23] 出土的甗、碗及盒类陶器均具有前段特点，并出有文帝四铢半两，报告推测该遗址年代下限在文景之际，属于南越国前期。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24] 出有秦末汉初半两钱，也出有仅见于后段的陶器，该遗址作为宫苑建筑当从南越国前期延续至南越国后期。

珠江三角洲区南越国前、后两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相承，但也表现出一些时代变化。前期多是中小型墓，部分墓葬延续了战国墓葬设置二层台、墓底设置腰坑或铺小石的做法，器物组合以瓮、罐、甗、碗、盆、釜等实用陶器为主，部分墓葬见有汉式陶礼器鼎、盒、壶、钺组合。后期多见大中型墓，包括几座王侯级别的大墓，普遍见有汉式陶礼器组合，伴出瓮、罐等实用陶器。陶器形制亦有变化，如盒、甗等陶器由流行捉手状盖钮发展为流行半环形盖钮，一些陶器出现最大腹径下移、平底加大等变化趋势。此外，铜罍等器物仅见于南越国前期，四耳罐、三足罐、格盒、温壶等陶器和屋、仓、灶等陶模型明器出现于南越国后期。

西汉中后期本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出现明显变化，除少量土坑墓外均为木椁墓，不见墓底设腰坑或铺小石的情况。器物组合方面，鼎、盒、壶、钺的汉式陶礼器组合不完整，屋、仓、井、灶等陶模型明器数量明显增多，且成套出现；三足罐、三足盒、小盒等地方特色器物几近消失，西汉后期出现簋、三足釜等陶器和禽畜俑；瓮、罐、鼎、提筒、匏壶等陶器的器型、纹饰均有较大变化。此外，滑石璧代替了玉璧，纹饰也由谷纹变为圆圈纹和涡纹。

东汉时期珠江三角洲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普遍流行砖室墓，木椁墓仅在东汉前期占有一定比例。陶器组合、形制与西汉后期基本相同，瓮、甗、五联罐等器物消失，常见随葬铜镜、铜钱。

二、粤东区

粤东区战国秦汉遗存发现不多，主要分布在揭阳、澄海、五华、龙川等地。战国时期至西汉前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富有地方特色，其后逐渐与中原地区趋于一致，不过粤东区始终不见三足罐、三足盒、联罐、匏壶等岭南地区的越式器物。

本区战国遗存主要是揭东面头岭墓地^[25]的13座战国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未见二层台结构，也没有墓底设腰坑或铺小石的情况，随葬陶器以瓮、罐类为主。面头岭墓地的M5、M7、M15和M26属于南越国时期，出土陶瓮与《广州汉墓》所划分的西汉前期前段的A型I式瓮相似，陶甑与当地战国时期的同类器物接近，属于南越国前期。澄海龟山遗址^[26]南越国时期遗存和五华狮雄山遗址^[27]出土的釜、罐、盆等陶器与《广州汉墓》所划分的西汉前期后段的同类器物相似，属于南越国后期，新发表的材料表明五华狮雄山遗址也存在南越国前期遗存^[28]。此外，揭东县先秦两汉遗址^[29]、揭西县赤岭埔遗址^[30]均包含南越国时期遗存。

面头岭南越国前期墓葬出土陶器只有瓮、甑两类，陶瓮周身施米字纹，B型陶甑与广州汉墓的陶甑形制有别，却与增城西瓜岭战国遗址出土的罍、盂类陶器相似，也有学者认为增城西瓜岭属于秦汉时期^[31]。本区南越国前期陶器的种类、形制、纹饰均继承了当地战国时期陶器特征。澄海龟山遗址和五华狮雄山遗址出土的南越国后期陶瓮与面头岭南越国前期陶瓮差异较大，釜、罐、盆等陶器与《广州汉墓》所划分的西汉前期后段同类器物相似。本区南越国后期出现罐、釜、盆、提筒等陶器，纹饰以戳印方格纹为主，另有篮纹、弦纹、水波纹、复线大纹等，这些新出现的文化因素与珠江三角洲区接近，绳纹板瓦和筒瓦、卷云箭镞纹瓦当也与广州南越国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基本相同。

粤东区西汉中期及之后的考古发现很少，东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岭南大部分地区相似。龙川佗城东汉墓^[32]随葬鼎、罐、壶等陶器和仓、屋、井、灶等陶模型明器，以及昭明镜、四神镜、五铢钱等，形制与岭南其他地区基本相同，只是没有珠江三角洲区常见的陶盒。

粤东区与珠江三角洲区毗邻，东江水系纵穿贯通。五华狮雄山遗址曾被认为与赵佗“长乐台”有关，根据出土的“定褐之印”“定褐丞印”封泥等，现推测该遗址为秦和南越国时期的县级行政单位“定褐”治所^[33]。龟山遗址当与南越国后期揭阳县的设置有关^[34]。

三、粤北区

粤北区战国遗存主要包括乐昌对面山战国墓葬^[35]和始兴白石坪遗址^[36]，不过有学者认为白石坪遗址已经进入秦汉纪年^[37]。南越国遗存以乐昌对面山墓地的西汉前期墓葬最为集中，还包括曲江马坝摇松岭M1^[38]。西汉中期以后本区考古遗存的分布范围扩大至韶关^[39]、曲江^[40]、南雄^[41]、始兴^[42]、清远^[43]等地。

乐昌对面山墓地从春秋时期延续至东汉晚期，代表了粤北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本区战国时期至西汉前期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比较浓厚，西汉中期以后开始与

珠江三角洲区趋同，不过一些器物出现的时间较晚。

乐昌对面山墓地发掘战国墓葬 17 座，多为狭长形土坑墓，少见二层台结构，随葬器物不见陶瓮，侈口耸肩罐、盘口罐等陶器具有地方特色，陶鼎形制也较特殊。始兴白石坪遗址出土陶器的种类较多，包括瓮、罐、双耳罐、盒、钵、杯等，也出有盘口罐。

乐昌对面山墓地的 53 座西汉前期墓葬分属南越国前期和南越国后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均有较明显差异。曲江马坝摇松岭 M1 的 Ah 型 II 式陶罐和陶釜具有晚期特征，属于南越国后期。本区南越国时期出现瓮、釜等陶器，Bb 型和 C 型陶罐的形态继承了当地战国时期侈口耸肩罐、盘口罐的特点。

西汉中期及之后粤北区的考古发现增多，尤其是东汉墓葬数量较多，考古学文化面貌逐渐与珠江三角洲区趋于一致。除乐昌对面山墓地外，其他地点的东汉墓葬均为砖室墓，汉式器物数量增加。本区西汉中期以后仍然存在地方特征，如战国时期以来的侈口耸肩罐、盘口罐等陶器的形态得以延续，陶壶、灶、井等陶模型明器出现在西汉中期，三足盒、匏壶等南越式器物东汉时期才出现，均晚于珠江三角洲等文化区；三足釜、熏炉亦迟至东汉时期出现。

粤北区与珠江三角洲区均有少量设置二层台的墓葬，但远不及桂东北区普遍。本区一些南越式陶器数量少（如五联罐仅西汉中期发现 1 件），而且较珠江三角洲区出现时间晚（如广州汉墓的三足盒在西汉中期即已绝迹），显然是受到后者的影响。两地陶器形制亦有差别，陶提筒当是后者影响下的仿制器物。此外，粤北区东汉墓葬的禽畜俑远不及珠江三角洲区流行。本区对珠江三角洲区也产生文化影响，如陶簋在本区始见于西汉中期，而广州汉墓是在西汉后期出现，应该是粤北区先接受了长沙等地的文化因素，再传播至珠江三角洲区。

粤北区是通往岭北和中原的要冲之地，沿北江水系南下可直抵番禺，南越国在粤北地区修建了浞浦关、湟溪关、乐昌“赵佗城”、仁化新城、“万人城”等关隘戍所^[44]。珠江三角洲区与粤北区的文化互动很密切，这种互动关系更大程度上是珠江三角洲区文化因素对粤北区的输出。

四、桂东北—粤西区

桂东北—粤西区战国遗存非常丰富，尤其以西江沿岸及其周边地区分布集中，包括德庆^[45]、四会^[46]、广宁^[47]、罗定^[48]、封开^[49]、岑溪^[50]等地，贺县^[51]、象州^[52]也有发现。南越国墓葬相对较少，包括西江沿岸的封开和桂东北的平乐、贺县、兴安等地亦如此，有学者认为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53]实际属于西汉前期^[54]，贺州高寨城址、贺州长利村城址、兴安通济村城址可能与南越国有关^[55]。西汉中后期遗存主要分布在桂

东北的平乐、钟山及藤县^[56]、柳州^[57]等地，东汉遗存分布范围扩大至西江沿岸的肇庆^[58]、封开^[59]和桂东北的梧州^[60]、柳州^[61]、昭平^[62]、恭城^[63]、钟山^[64]、兴安^[65]、阳朔^[66]、平乐^[67]、岑溪^[68]等地。

本区秦汉遗存以平乐银山岭“战国墓”^[69]、银山岭汉墓^[70]和钟山铜盆墓地^[71]具有代表性。平乐银山岭墓地已发表资料的汉墓有45座，划分为西汉前期、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三期。有学者认为平乐银山岭110座“战国墓”属于西汉前期^[72]（参见附录《平乐银山岭墓地的年代学问题》）。钟山铜盆墓地发掘汉墓47座，划分为西汉前、中、晚三期和东汉前、后两期。本区战国秦汉时期为西瓯聚居地^[73]，南越国墓葬大量继承了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西汉中期以后汉文化因素显著增加，土著文化特征逐步消失或者融入了汉文化。

战国时期流行狭长形土坑墓，常见墓底设置腰坑或铺小石，部分墓葬设置二层台。随葬器物组合一般为铜兵器/陶纺轮+铜、铁生产工具+生活实用陶器，以铜器为主。矛、戈、剑、镞等铜兵器和刮刀、削等铜工具发达，铜兵器上多见“王”字、“出”字和人面纹，人首、禽首铜柱形器极有特色。陶器以泥质硬陶为主，多为瓮、罐、甑、杯、碗等实用器。

本区南越国墓葬存在时段差别。封开利羊墩墓地^[74]的A型I式陶瓮仅见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前段，C型I式罐、A型I式三足盒等陶器具有早期特征，属于南越国前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主要属于南越国前期；银山岭西汉前期墓葬的D型III式陶鼎是由当地前期陶鼎发展而来，四联陶罐的卷曲短足是晚期特征，属于南越国后期。贺县金钟M1^[75]为王侯墓葬，其“封门式”木椁结构见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后段，Aa型III式罐、Aa型I式及II式双耳罐、Aa型II式及Ac型壶、II式钫、Aa型III式鼎等陶器仅见于后段，属于南越国后期，甚至更晚^[76]。贺县河东高寨墓地^[77]和兴安石马坪墓地^[78]的西汉前期墓葬分属南越国前、后期。灵川马山M6出土器物较少，期别难辨。

南越国前期墓葬设腰坑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随葬器物中陶器数量明显增多，以瓮、罐、盒、杯等实用器为主，基本不见鼎、壶、钫等汉式陶礼器。随葬铜器仍然占有较大比例，不过铜兵器减少，而且基本不见“王”字等纹饰；人首柱形器也仅见于少量墓葬。南越国后期墓葬与珠江三角洲区基本一致，木椁墓比例增加，腰坑减少，很少出有铜兵器，而陶器种类明显增多，出现钫、匏壶、双耳罐、盆、盂、甑等陶器，汉式陶礼器组合已经有一定数量。

西汉中后期本区不再见有狭长形土坑墓，基本为木椁墓，部分设置斜坡墓道，仅平乐银山岭的少量西汉中期土坑墓尚延续前期的二层台结构和设置腰坑，随葬品很少，陶釜取代了其前的陶罐。本区西汉后期墓葬出现屋、仓、井、灶等陶模型明器和滑石器，随葬陶器的种类、形制与珠江三角洲区基本一致，不过陶器组合以鼎、罐为主。

本区东汉墓葬仍然存在地方特征，以土坑墓、木椁墓为主，仅在兴安、阳朔、岑溪等地见有砖室墓，昭平、恭城、钟山、阳朔等地发现东汉晚期石室墓。此外，本区东汉时期的随葬器物中不见禽畜俑，部分墓葬底铺木炭，钟山县张屋部分东汉墓延续了墓底设腰坑的做法。

桂东北地区是贯通南岭的重要通道，秦征服岭南时开凿了灵渠，南越国建立后强化了兴安严关和秦城的防卫^[79]，“苍梧王赵光”^[80]的封地在今梧州一带。珠江三角洲区南越国墓葬存在设置二层台、墓底设腰坑或铺小石的情况，但远不及本区普遍。南越国后期桂东北—粤西区出现的陶器种类和汉式陶礼器主要见于贺县附近墓葬，在平乐银山岭墓地出现的时间要晚到西汉中后期，可以认为珠江三角洲区对本区的文化影响是逐步推进的。此外，平乐银山岭 M119 的 A 型陶觶尊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前段的 B 型陶觶尊相似，也反映出两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

五、桂东南—粤西南区

桂东南—粤西南区战国秦汉时期遗存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比较特殊，战国遗存罕见，南越国遗存主要包括贵县罗泊湾 M1、M2 和风流岭 M31 等王侯贵族墓葬，以及徐闻五里镇遗址和 M1^[81]。近年合浦有南越国墓葬^[82]和遗址^[83]的报道（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墓葬主要集中在贵县^[84]、合浦（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两地，徐闻^[85]、北海^[86]、高州^[87]等地也有发现。西汉中期以后本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逐步发生转变，最终与汉文化融为一体。

本区南越国墓葬出土器物大多具有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后段的特点，属于南越国后期。贵县罗泊湾 M1、M2^[88]出土的 A 型 III 式和 B 型 II 式三足盒、温壶、三足罐等陶器仅见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后段，其他陶器前、后两段均存在，属于南越国后期。贵县风流岭 M31^[89]设置车马坑，没有出土陶器，与罗泊湾 M1、M2 时代应相差不远。徐闻五里镇遗址出土的 Aa 型 III 式陶罐仅见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后段，Ab 型 II 式陶罐尖唇、沿面外斜的较晚特征见于广州汉墓西汉中期，属于南越国后期。

西汉中后期本区多见中小型竖穴木椁墓，多数设斜坡墓道，合浦堂排 M2B^[90]在墓道一侧设横侧室；二层台结构或者墓底设腰坑、器物坑的现象已经消失，个别见有墓底铺鹅卵石。随葬器物基本不见陶瓮，而带耳罐、罍、罍等陶器和铁三脚架等器物较为多见，个别墓葬出有铜鼓。

东汉时期本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岭南其他地区及中原地区基本无异。流行砖室墓，见有“凸”字形、“T”形、“中”字形、“土”字形等形制，竖穴木椁墓仅见于贵县部分墓葬。陶器大多器形规整、施青黄釉，陶罍基本不见，陶罍少见，个别随葬铜鼓。

学术界多认为本区是西瓯、骆越的杂居之地^[91]，与西瓯聚居地桂东北—粤西区、骆越聚居地桂西区有着比较密切的文化交往，尤其是南越国后期墓葬兼具周边文化区特征。贵县罗泊湾 M1 墓底设置殉葬坑、器物坑，以及贵县风流岭 M31 和徐闻二桥 M1 分别设置熟土、生土二层台或许是受到桂东北—粤西区设置腰坑、二层台的影响，贵县风流岭 M31 烘烤墓壁的做法与桂西区武鸣元龙坡战国墓^[92]相似，随葬陶器以瓮、罐为大宗亦与平乐银山岭墓地流行瓮、罐陶器组合一致。

六、桂西区

桂西区战国秦汉时期遗存主要包括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93]及安等秧墓地^[94]、田东锅盖岭墓^[95]、西林普驮铜鼓墓^[96]，以及宾阳县战国墓^[97]、武鸣邕马山岩洞葬^[98]和独山岩洞葬^[99]等。有研究者指出有些发掘报告年代推断偏早，认为元龙坡墓地、邕马山岩洞葬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马头安等秧墓地、独山岩洞葬属于西汉早中期，田东锅盖岭墓属于西汉中期，西林普驮铜鼓墓属于西汉晚期^[100]。本区遗存主要集中在战国时期至西汉前中期，受滇文化影响较强烈，其中南越国遗存包括武鸣安等秧墓地和独山岩洞葬。

除武鸣马头邕马山岩洞葬外，本区战国墓葬均为狭长形小型土坑墓。武鸣元龙坡墓地有 16 座墓葬设置二层台，有的带长方形或半圆形侧室，有些墓葬烘烤墓壁或墓底。随葬器物的滇文化特征较浓厚，以铜鼓、羊角铜钮钟、铜铃等为典型，使用玉镯、玉块等随葬亦习见于滇墓；越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随葬铜兵器及矛、戈、剑的形制方面，刮刀、叉形器属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武鸣元龙坡墓地和邕马山岩洞葬出土陶器以夹砂粗陶的圜底器为主，与滇池地区近似。

南越国时期的武鸣马头安等秧墓地和独山岩洞葬出土陶器的形制难以与广州汉墓进行对比。安等秧墓地均为狭长形土坑墓，基本未见汉式器物的影响，独山岩洞葬沿袭了邕马山岩洞葬的葬俗，可能属于南越国前期。本区南越国遗存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继承了当地战国遗存的特征，如武鸣马头安等秧墓地和独山岩洞葬出土的 D 型陶釜与元龙坡战国墓地相似，多见随葬玉镯、玉块等；但是越文化因素更为强烈，如陶器均为实用器，大多为夹砂粗陶。不过此阶段狭长形土坑墓的长宽比小于战国时期墓葬，出现泥质印纹陶，平底器数量明显增多。

西汉中后期本区继续受到云南地区和岭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双重影响。田东锅盖岭墓出有属于云南青铜文化的石寨山型铜鼓、一字窄格铜剑和属于岭南青铜文化的扁茎铜剑、长胡铜戈、长方釜铜斧，以及两个地区共有的对耳铜矛、风字形钺等器物。西林铜鼓葬出有属于云南青铜文化的石寨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羊角铜钮钟、窄铜格铁剑等器物。铜骑马俑、坐俑、六博棋盘、洗、铜、耳杯、车马具等属于汉武帝平定

西南夷后传入的汉文化因素^[101]。

桂西区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居民为骆越^[102]。由于族群背景的共性，本区与桂东南—粤西南区存在比较密切的文化联系，如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见有船形结构二层台，而贵县罗泊湾 M1 殉葬坑出有圆木棺，又如前述烘烤墓壁的做法。右江水系是滇文化联系岭南的通道，本区与桂东南—粤两南区均存在石寨山型铜鼓、羊角铜钮钟、长身铜铃等滇式器物。

在主要依据墓葬材料划分的南越国诸考古学文化区中，以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区居于核心区位，与其他文化区之间保持着文化交流和互动，引领着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方向。整体而论，珠江三角洲区、粤北区、桂东北—粤西区、桂东南—粤西南区更具考古学文化共性，桂西区、粤东区、越南北部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特殊，而桂东南—粤西南区与桂东北—粤西区、桂西区之间存在着较多的文化联系。

战国时期岭南不同地理单元之间、南越国不同文化区之间，以及南越国与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滇文化、东南亚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基础格局。虽然南越国灭亡后，以珠江三角洲区为中心的西汉南海郡出现了经济、文化大幅衰退现象^[103]，但是岭南地区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仍然大致可以与南越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相对应，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在南越国遗存的基础上多有承续，并且与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行政格局和族群分布格局存在关联性。

-
- [1] 卓猛:《南越国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分区研究》, 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 [2]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广东增城、始兴的战国遗址》,《考古》1964年第3期。
- [3] 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 [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第二次发掘》,《文物》2000年第6期。
- [5]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〇年》,文物出版社,2010,第47-58页。
- [6]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狮带岗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207-212页;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东山梅花村八号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262-281页;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横枝岗西汉墓的清理》,《考古》2003年第5期,等等。
- [7] 广东省博物馆:《广州沙河顶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86年第12期;李始文:《中大校园的东汉墓》,《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沙河顶汉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213-221页,等等。
- [8]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员岗村东汉墓》,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222-247页;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博物馆:《广东番禺市屏山东汉墓发掘报告》,载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14》,文物出版社,2004,第161-190页;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番禺区文管会办公室:《番禺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
- [9]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增城金兰寺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1期。
- [10]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清理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
- [11] 广东省博物馆、顺德县博物馆:《广东顺德陈村汉墓的清理》,《文物》1991年第12期。
- [1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莞市博物馆:《广东东莞虎门东汉墓》,《文物》1991年第11期。
- [13] 广东省博物馆、博罗县博物馆:《广东博罗县福田镇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 [14] 屈志仁著、香港博物馆编辑:《李郑屋汉墓》,香港市政局,1970;白云翔:《香港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及其意义》,《考古》1997年第6期。
- [1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
- [16]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东郊罗岗秦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 [17]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黄花岗东汉砖室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222-234页。
- [18]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先烈南路大宝岗汉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235-261页。
- [19]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西村凤凰岗西汉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197-206页。
- [20]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 [21] 黄森章:《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记要》,载广州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穗港汉墓出土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3,第248-252页。
- [22]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35-48页。
- [23]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李灶新:《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第三次发掘》,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广州出版社,2001,第85-110页。

-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官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
- [25] 魏峻：《揭东县面头岭墓地发掘报告》，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揭阳考古》，科学出版社，2005，第51-102页。
- [26]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澄海市博物馆、汕头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 [2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五华县博物馆：《广东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年第11期。
- [28]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华狮雄山》，科学出版社，2014。
- [29] 魏峻：《揭东县先秦两汉遗址调查报告》，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揭阳考古》，科学出版社，2005，第129-180页。
- [30] 魏峻：《揭西县赤岭埔遗址调查报告》，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揭阳考古》，科学出版社，2005，第190-200页。
- [31]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〇年》，文物出版社，2010，第47-58页。
- [3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川县博物馆：《广东龙川县佗城东汉墓清理报告》，《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
- [33]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华狮雄山》，科学出版社，2014，第182-183页。
- [3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澄海市博物馆、汕头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 [35]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乐昌市博物馆、韶关市博物馆：《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 [36] 莫稚：《广东始兴白石坪山战国遗址》，《考古》1963年第4期；廖晋雄：《广东始兴县白石坪山战国晚期遗址》，《考古》1996年第9期。
- [37]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〇年》，文物出版社，2010，第47-58页。
- [38]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马坝的一座西汉墓》，《考古》1964年第6期。
- [39]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韶关市郊古墓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8期；杨豪：《广东韶关西河汉墓发掘》，载《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43-157页。
- [40]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7期；曲江博物馆：《广东曲江樟市群星东汉墓》，《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 [41] 南雄县博物馆：《粤北南雄发现汉墓》，《考古》1985年第11期。
- [42] 始兴县博物馆：《广东始兴县禾场岭发现东汉墓》，《考古》1991年第1期。
- [43]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远市博物馆：《广东清新县布坑东汉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2》，文物出版社，2008，第275-281页。
- [44]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70-72页。
- [45] 广东省博物馆、德庆县文化局：《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
- [4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乌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 [47]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载《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1》，1981，第111-119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县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98年第7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宁龙嘴岗墓地》，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肇庆古墓》，科学出版社，2008，第4-25页。
- [48]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第1期；广东省博物馆、罗定县文

化局:《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49] 杨式挺、崔勇、邓增魁:《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5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岑溪县文物管理所:《岑溪花果山战国墓清理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13-227页。

[51] 贺县博物馆:《广西贺县龙中岩洞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州市博物馆:《贺州市高屋背岭古墓群勘探与试掘》,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59-264页。

[5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象州县发现一批战国文物》,《文物》1989年第6期。

[53] 广东省博物馆发掘小组、肇庆市文化局发掘小组:《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54]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55] 熊昭明:《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5-41页。

[56] 藤县博物馆:《广西藤县鸡谷山西汉墓》,《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57] 柳州市博物馆:《广西柳州市九头村一号汉墓》,《文物》1984年第4期。

[58]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肇庆市康乐中路七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1期。

[59]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封开县江口汉墓及封川隋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第134-140页。

[60] 梧州市博物馆、李乃贤:《广西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135-142页。

[61] 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郊东汉墓》,《考古》1985年第9期。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昭平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昭平东汉墓》,《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63] 广西恭城县文管所:《广西恭城县牛路头发现一座东汉石室墓》,《考古》1998年第1期。

[6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钟山县博物馆:《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6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白塘古墓发掘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86-289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兴安界首汉晋墓的清理》,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90-295页。

[66]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阳朔县文物管理所:《2005年阳朔县高田镇古墓葬发掘报告》,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132-225页。

[67]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平乐县文物管理所:《2005年平乐县木棺汀发掘报告》,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226-315页。

[6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岑溪市文物管理所:《广西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东汉墓发掘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纪念广西考古七十周年专集》,科学出版社,2006,第285-312页。

[6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7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71]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钟山县文物管理所:《钟山铜盆汉墓》,科学出版社,2018。

[72]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73] 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

[74] 杨式挺、崔勇、邓增魁:《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7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贺县文物管理所:《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76] 熊昭明:《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5-41页。

- [7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29-45页。
- [7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兴安石马坪汉墓》，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38-258页。
- [79]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75页。
- [80] [汉]班固：《汉书·南粤传》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62，第3855页。
- [8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 [8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
- [83] 熊昭明、富霞、陈启流：《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8期。
- [84] 黄增庆：《广西贵县汉木椁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贵县汉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黄增庆：《广西贵县新牛岭三号西汉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北郊汉墓》，《考古》1985年第3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贵港市文物管理所：《广西贵港深钉岭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 [85]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
- [8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 [87] 钟绍益、刘明宽：《广东高州军墟后岭发现两座东汉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第149-150页。
- [8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考古》1982年第4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
- [8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 [9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46-56页。
- [91] 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42页。
- [9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9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9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9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79年第6期。
- [9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
- [9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宾阳县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83年第2期。
- [9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邕马山岩洞葬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99]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100]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273页。
- [101]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 [102] 韦仁义：《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文物》1988年第12期。
- [103] 刘瑞：《禁锢与脱困——汉南海郡诸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254-272页。